

# 發現孩童與失去孩童

## 論魯迅對孩童屬性的建構\*\*

顏 健 富\*

### 摘 要

本篇論文討論在新舊中國的交嬗中，孩童的屬性在特定話語體系下的轉變，從孩童與國族命運的關係探討魯迅對孩童屬性的建構。將五四的「長者本位」移位向「幼者本位」的孩童論述，放到魯迅個人「吶喊」到「徬徨」的精神歷程參照，從中分析孩童形象的移位。在《吶喊》集裡，受傳統舊文化荼毒的孩童被塑造成亟待拯救的「受害者」，作為反抗傳統的指標，而在《徬徨》集裡一變而為庸眾的共犯，反射的是作者的「徬徨」歷程，已不再吶喊。由此指出魯迅在高喊「救救孩童」的同時，卻讓孩童背負著沈重的時代負擔，又以另一種意識型態的牢籠框套著孩童。孩子帶有如此大的轉折，其屬性一再被重構，顯示了孩童在「幼者本位」下的被「發現」，卻與「失去」是一體兩面的。

關鍵詞：魯迅、孩童、屬性、吶喊、徬徨

### 一 前言：新中國的想像

五四時期眾多作家紛紛鬧鬧著建構新中國，或是憂心國局、或是批判腐朽傳統，鼓吹以「新學說」<sup>1</sup>救國，呈現出擺脫舊中國包袱，期待新中國到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 本論文為參與梅師家玲 90 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現代小說中的孩童論述」所得之部分成果。

1 這裡所謂的「新學說」類似梁啟超的「新民」說、陳獨秀批判孔教，倡導「科學」與「民

臨的趨勢，當中融合著期許、憂心、焦慮等錯綜情感，遂成就一則「感時憂國」<sup>2</sup>的書寫。因受到西方啟蒙的影響，中國式的「倫理」受到反思，<sup>3</sup>掀起了以「人」為中心的啟蒙運動，「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事務，其首位在人，人立而後凡事舉」。<sup>4</sup>對「人」的發現，婦孺的地位也重新受到審視，在《燈下漫筆》裡魯迅（1881-1936）提到「人肉筵宴」的排位：「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昧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sup>5</sup>魯迅接續根據《左傳》將人分十等：王、公、大夫、士、皂、隸、僚、僕、台，每一個階層壓制其底下的階層，而最底下的「台」，卻「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對中國傳統封建的階層制加以批判，對「妻」與「子」地位的邊緣性也有其透視與關注。

擺在這種時代的「話語形構」<sup>6</sup>（discursive formation）下，梁啟超（1873-1929）、魯迅、周作人（1885-1967）乃至三〇年代的左翼敘述發現處於邊緣地位的孩子的地位，並寄予眾多期待，「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sup>7</sup>將孩子與國家未來的命運聯繫起來，強調他們是革命年代被賦予重任與想像的重要象徵。梅家玲教授曾針對家國與少年之間的關係作出如下評論：

主、胡適主張有機吸收西方文化，均呈現出一股新氣象，當中大量借用西方觀念，以推倒中國舊有的文化體系。

- 2 夏志清，〈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愛情社會小說》（臺北：純文學，1974），頁79-105。夏志清用「感時憂國」來評論「新文學」，將作品「表現道義上的使命感、洋溢著愛國熱情、痛感外憂內患、憂時傷國稱為「感時憂國」的精神。
- 3 如陳獨秀（1879-1942）就在《吾人最後之覺悟》說：「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使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近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覺悟，蓋猶在恍恍迷離之境。」《青年雜誌》，1：6（1916.2），頁4。
- 4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臺北：谷風，1989），卷1，頁57。
- 5 魯迅，《墳》燈下漫筆，《魯迅全集》，卷1，頁217。
- 6 所謂「話語形構」，根據傅珂（Michel Foucault）的說法，乃是「社會各層面都有其特定的話語（discourse）存在。這些話語互相推衍連結，形成一個可以辨認的『話語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如『社教制度、經濟及社會體系、行為模式、以及各種系統規範』中。在此一話語形構下，所有知識之獲取及思維行動之方式都有一定軌跡可尋，而由此產生的一個特殊的文化及認知體系，就是前已提及的『知識領域』。」見米歇·傅珂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1995），頁29。
- 7 魯迅，《南腔北調集》上海的兒童，《魯迅全集》，卷4，頁562。

「少年中國」之說，卻是在肯定少年原先即具有的「青春」、「進取」、「希望」等意義的同時，更視其體現「現代性」的表徵，對他投射了大量「革新」、「進步」、「光明的開端」等關乎「新國家」的憧憬想像。<sup>8</sup>

事實上梅教授論述的對象還可擴大到孩童身上，因為在開拓現代性的版圖上，孩童的特質正好代表前朝的結束，新時代的開始。孩童或少年身上寄寓大量啟蒙的想像與國族論述，正好提醒我們從傳統走到現代，孩童的地位從邊緣化到中心化，其屬性（identity）的建構在這新舊文化系統中呈現出極大轉變。孩童主體的建構由此耐人尋味，「所述主體」是「一個可由不同的個人來填補的特殊、空白所在——原因正是在於主體的位置可以被指定」，<sup>9</sup>「孩童」的主體位置因其所處場域的不同而被不同的價值體系所填補，進而被指定在上／下、中心／邊緣的位置。

從對人的發現到兒童的發現，孩童的位置由下而上提升，這樣的過程看似理所當然，可是其中隱藏的矛盾性卻是一般論者所忽略的。五四在西方「人本」觀念下倡導兒童的獨立個性，諸如「（兒童）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內外兩面的生活」<sup>10</sup>「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於孩子的發達。」<sup>11</sup>但是當把孩子放到「民族—國家」的集體性觀念時，孩子卻又被賦予成人的政治想像。這當中的矛盾其實在西方社會史裡一直存在，當步入文明社會重新發現兒童的概念，「以之為人倫社會進步之重要指標」，卻又是為「童年步步制度化、物質化、與牢籠化的開始。」<sup>12</sup>

五四啟蒙分子一方面在新舊文化思想的對照下發現兒童的主體性，一方面卻用成人想像預設兒童的主體性，形成矛盾的狀況。而此矛盾狀況，事實

8 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19：1（2001.6），頁256。

9 邱彥彬，〈我被決定故我在？：論傅科與拉崗的主體論〉，《中外文學》，25：5（1996.10），頁80。

10 周作人，〈兒童的文學〉：「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內外兩面的生活。兒童期的二十幾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但一面也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見《周作人全集》（臺中：藍燈文化，1982），卷5，頁255。

11 魯迅，〈墳〉我們現在怎樣作父親，《魯迅全集》，卷1，頁136。

12 熊秉真，〈人情入理：明清幼學發展與兒童關懷之兩面性〉，《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史》（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9），頁339。

上正呼應著五四「救亡圖存」的書寫背景，一方面在現代化的思潮下，對「人」的定義有所新發現，可是一方面卻又在作者「感時憂國」的情懷下被填補上了某種特定的想像，而面臨主體性消失的危機。若我們將視角放到文本中，可發現在此「填補」的過程中，各階層人物有著不同的進展軌跡，本論文將焦點放在過去鮮為人所關注的兒童身上，探討在此「發現」與「失去」的軌跡中，孩童如何在特定的話語體系下展現身段？

## 二、發現兒童：從「長者本位」到「幼者本位」

以「長者」為本位的傳統體制，到了五四時期，受到西方的啟蒙體系的衝擊，兒童得以被大量論述，魯迅提出「幼者本位」使得兒童的概念重新被召喚與命名：「希望覺醒的人，應該洗淨了東方古傳的謬誤思想，對於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力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做幼者本位的道德。」<sup>13</sup>

顯然地，魯迅以上的說法是經由西方思潮所開拓出來，在西方「義務思想」的觀念下，對照出本身文化的「權力思想」，其觸角正好針對著論述背後隱藏的「長者本位」，形成「五四反傳統主義以『西學』（西方之本主義文化）反『中學』（中國封建傳統文化）」<sup>14</sup>的策略。

在強烈的自覺意識下，魯迅對整個社會環境的兒童關懷有其焦慮與批判，當「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兒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sup>15</sup>「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sup>16</sup>在此我們看到他把「長者」與「幼者」的位置並列，以剖析新時代中「長者」

13 同註11，頁132。

14 汪暉認為這種反抗精神在思維內容上直接承續了譚嗣同對封建綱常的沈痛攻擊、嚴復對於中西文化尖銳對比的精神分析、梁啟超大力提倡的「新民學說」，但形成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性理解的更為重要原因，是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歷史過程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啟示。見汪暉，〈文化／心理結構〉，《反抗絕望——魯迅及其「吶喊」「徬徨」研究》（臺北：久大，1990），頁67-68。

15 同註7。

16 魯迅，《墳》娜拉走後怎樣，《魯迅全集》，卷1，頁164。

與「幼者」之間的關係，突顯出其中的危機，如「長者」對「幼者」的忽略，或是當「幼者」走向帶有權力意涵的「長者」位置時卻反而壓迫起「幼者」。為改變不良的惡性循環，應以「義務」思想來取代傳統的「權力」觀，「洗盡了東方古傳謬誤的思想」，他在《我們怎樣作父親》一文，提出父親教育兒童的方法，第一是「理解」，第二是「指導」，第三是「解放」。<sup>17</sup> 在這種兒童教育的架構下，使得他一方面對教育兒童的傳統方式做了諸多反思與建議，激烈批判摧殘孩童的舊文化機制，一方面在「童年概念」(concept of childhood) 與「兒童對待」(treatment of children) 的層面上對孩童的面貌、特質等有眾多發現。

二十四孝圖 裡，魯迅揭開二十四孝中的荒唐、虛偽，其中他感到最不滿的是「郭臣埋兒」與「老萊娛親」，前者記述郭臣欲埋掉幼兒以免分去母親的糧食，後者批判七十多歲的老萊子「詐跌仆地，作嬰兒啼」<sup>18</sup> 以取悅母親，當中的不符倫理或是矯情，對兒童做了不良示範。可是他的批判視角並不停留於過去，對當今的孩童心靈如何受到傷害更是關注：在「改革過的中國」，當孩子早已從「孟京哭竹玉祥臥冷」的古訓中蛻出時，居然又有一些新式的「愛國之士」，「或者用筆，或者用舌，不怕勞苦的來給他們教訓。一個說要用功，古時候曾有囊螢照讀、鑿壁偷光的志士，一個說要愛國，古時候曾有十幾歲突圍請援、十四歲上陣殺敵的奇童」<sup>19</sup> 的觀念。

對傳統大開殺戒時，讓我們看到五四學人以西學來「糾正」傳統的策略，他從西方引入兒童讀本，如翻譯《愛羅先珂童話集》、《錶》、《小約翰》等，對西方兒童的大量翻譯成了五四文壇可觀的成績，兒童文學的創作與理論架構的建設漸受到重視。他在翻譯之餘，親身創作以兒童為題材的作品，如其《朝花夕拾》是一系列追憶往事的童年母題的作品，其中《五猖會》、《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篇更是處理了童時的受創經驗，回顧童年的「坎坷」，缺乏尊重兒童的大環境與妥當教育孩童的方式。

17 魯迅這裡的「理解」是針對中國人把兒童當成「縮小的成人」的誤解，他認為孩子與成人世界不同，因此要用「理解」的態度對待孩童。長者不應以命令的方式，而是「指導」，以養成其耐勞體力、高尚道德、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解放」是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成為獨立的人，而非屬於父母的人。同註 11，頁 136-137。

18 魯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圖，《魯迅全集》，卷 2，頁 250。

19 魯迅，《且介亭雜文》難行和不信，《魯迅全集》，卷 6，頁 49。

魯迅在「幼者」本位之下，了解孩子自有其世界，並非「縮小的成人世界」。<sup>20</sup> 從孩子的角度出發，他注重遊戲的重要性，「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sup>21</sup> 除此之外，他對孩童發出讚嘆之辭：「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語言；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sup>22</sup> 孩子這種「可佩」的特質，使得他相信孩童在「希望在於將來」<sup>23</sup> 的思維邏輯上肩負起「將來」的重擔，把一切希望投射到將來，魯迅因此呼籲覺醒者要「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sup>24</sup> 一方面也呼籲幼者勇猛前進：「前途很遠，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前面才有路去罷！勇猛著！幼者呵！」<sup>25</sup>

在發現兒童中，魯迅如上所述積極透過各方面管道改造兒童，如對傳統殘害兒童身心的「長者本位」做出犀利的批判，翻譯西方童話建構兒童面貌的範版，或是稱頌兒童的特質呼籲其向前邁進，因為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將來是子孫的時代」，<sup>26</sup> 孩童的改造成了國民性改造的象徵，如論者所說：

魯迅的童年母題創作，超越了一般性的童年趣事的回憶，達到了改造國民精神和重建民族人格的現代思想高度。<sup>27</sup>

我們由此看出魯迅對孩童改造的迫切性，淵源於對國民性的強烈不滿，基於「國民性可以改造於未來」<sup>28</sup> 的信念下，孩童成為五四知識分子「新民」<sup>29</sup> 的

20 同註11，頁136。

21 魯迅，《野草集》風箏，《魯迅全集》，卷2，頁178。

22 魯迅，《且介亭雜文》看圖識字，《魯迅全集》，卷6，頁35。

23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卷1，頁417。

24 同註11，頁131。

25 此乃是魯迅轉引日本作者有島武郎的話，見魯迅《熱風》與幼者，《魯迅全集》，卷1，頁362。

26 魯迅，《熱風》隨感錄五十七，《魯迅全集》，卷1，頁349。

27 譚桂林，論魯迅對現代童年母題文學的歷史貢獻，《魯迅研究月刊》，101（1990.9），頁31。

28 魯迅，《譯文序跋集》「出了象牙塔」後記，《魯迅全集》，卷10，頁246。

29 在新舊文化交替的過程中，眾多啟蒙分子提出「新民」說，如梁啟超《新民說》、少年中國說 提倡「新民」與賦予少年政治想像，做為改造國民性的策略。見《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1冊，頁655-735、409-411。

### 重要指標。

在「發現孩童」的基調下，孩童被放入國民精神改造的位置來觀看，與啟蒙論述聯繫，因此當魯迅歌頌未來世界屬於兒童、試圖將他們從封建體制解放出來時，事實上已如前述西方兒童社會史的「矛盾性」形塑出一個牢籠，套著兒童。在重新命名的過程顯見了內在的衝突，若我們繼續以長者／幼者的關係來看魯迅的小說，會看出更多的移位，兒童的屬性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是流動的。因此本篇論文在建構起魯迅的「發現孩童」時，卻很弔詭的一步步走向論證「失去孩童」的逆反方向。

## 三、「小說」孩童

魯迅的孩童觀具顯了從「長者本位」到「幼者本位」的過渡，這種過渡牽涉到眾多意義，將「長者」／「幼者」的關係探討放到「傳統」／「西方」的架構上來探討。孩童的屬性如前述在新舊世界有眾多的變動，而放到魯迅的小說裡，我挑選了其參與新文化運動的前後兩段時期，也是一般學者所謂的「吶喊」與「徬徨」時期作為時間上的對照點，以分析五四新舊文化衝突中兒童屬性的變動如何在其生命歷程的巨大變動中有錯綜複雜的移位。

### （一）孩童「吶喊」：對傳統的控訴

魯迅在早年曾以文言文寫《摩羅詩力說》，強調文學的功用，「啟人生之閔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學所不能言者」，<sup>30</sup>他相信文學可以改造精神，靠的是少數「不為順世和樂之音」的「摩羅詩人」。摩羅詩人是精神之戰士，「剛健不撓，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sup>31</sup>魯迅本身具體實踐了摩羅詩人的精神，他棄醫從文，以改造國民為志，展開了其「吶喊」的生涯。他曾因為與《新青年》其中一位負責人錢玄同抗辯「鐵屋子」理論而開始寫小說，以喚醒鐵屋子裡熟睡的大眾：

假如一間鐵房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就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

30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卷1，頁72。

31 同上註，頁99。

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sup>32</sup>

鐵屋子在這裡被喻為壓制人的傳統桎梏，魯迅意識到反傳統的困難性，喚醒了人，可是卻衝不出鐵屋子，徒然增加痛苦。不過本著「希望是在於將來」，希望是「不能抹殺的」的信念，<sup>33</sup>魯迅以摩羅詩人的姿態加入了「吶喊」的行列。在亢奮的狀態中，一再把觸角對準於傳統，做出全盤性的反傳統，如狂人日記的狂人激切喊出：「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喫人』！」

在吃人的陰影下，吃與被吃的主題在小說裡不斷回繞，小孩首當其衝，無論是在魯鎮或是鄉土，出場時大多奄奄一息，作者彷彿已肩不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狹隘幽暗」的地方去。魯迅曾把中國形象比作「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sup>34</sup>藥裡的革命青年夏瑜被殺頭，傳統迷信的社會相信其血有助於治病，用來蘸饅頭賣出。患有肺癆的小栓彷彿「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在父母的殷切期待下，吃蘸了血的饅頭，嚥下的是成人世界的昏庸悲劇，以其死亡向世界吶喊。孩子沒有策反的能力與選擇，只能作為一種犧牲品的方式，被母親悼念。明天裡單四嫂子以紡織養活三歲的寶兒，母子一向相依為命，可是寶兒卻陷入重病。單四嫂求神籤、許願，最後去求何小仙，得到「保嬰活命丸」的藥方，讓寶兒服下，一命嗚呼。很明顯的其中對宗教的迷信、落後的傳統做出強烈的批判，呼應的是作者的切身之痛，他在多處提到赴日學醫乃是為「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sup>35</sup>從現實的父親到小說的兒童因誤服迷信藥方而遇害，呈現的是對中國傳統的批判。尤其是這些無法選擇生命情境的孩童牽扯進去，赤裸裸看出整個宗教迷信如何箝制著芸芸眾生，即或像只有卑微願望的寶兒也無所逃遁，「媽 爹賣餛飩，我大了也賣餛飩，賣許多許多錢，我都給你」，傳承如此卑微的父業，卻注定要落空，魯迅用了近乎苛刻冷

32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卷1，頁418。

33 同上註。

34 魯迅，《熱風》隨感錄四十三，《魯迅全集》，卷1，頁329。

35 同註32，頁414。

酷的標準來對待其筆下的孩童，卻引發我們思考怎樣的「藥」才能「救救孩子」？由此兩篇小說裡的「藥」有著更深層的意涵，怎樣的「藥」才能打造未來新中國？

在講求現代化、科學的五四時代思潮中，魯迅透過無辜的「受害者」宣告與傳統絕裂。以上兩位被逼到死亡絕路的孩子，背負著整個中國古老的傳統弊病，未及成長，突顯大人的愚昧與迷信。孩子的犧牲由此成為凝視中國未來的方法，他們帶著沈重的使命感，質疑詰問中國的「明天」與「未來」，反諷的是兩篇小說裡病重的孩童，在小說敘事者對「明天」、「天亮」等光明燦景的期許中步入黑暗世界。華小栓與寶兒是吃藥而死，狂人日記裡的妹子則是被吃，但「吃」與「被吃」都殊途同歸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妹子比起病懨懨的小栓、寶兒更是死狀可怖，在劊子手或狼爪下連皮帶肉被吃，驚嚇恐怖，鮮血斑斑。五歲的妹子竟然被哥哥、母親混合在飯菜裡吃掉。狂人日記如此活生一幅人肉筵席，有著四千年吃人履歷的傳統。魯迅透過孩童的「受害者」身分的「失聲」反撲傳統封建，其「失聲」遙遙呼應的卻是狂人在小說末「救救孩子」的大分貝口號。作者將傳統封建當成全盤式的整體，大力批判，讓我們一再透視孩子如何被封建體制吃掉。

這些受傳統荼毒的孩童，命定被放到「弱者」的地位加以凝視、思考，如作者曾自說：「說到『為什麼』作起小說罷，我們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 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的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sup>36</sup> 在「吃」或「被吃」的架構上，以引起療救的注意，背後預設了「拯救者」與「被拯救者」的位置，小孩以其生命的消失揭發幾千年的「吃人」傳統外，更重要的是引起類似狂人、瑜兒等拯救者的注意，將他們從傳統的桎梏中救出。如果說魯迅的孩童觀是從「長者本位」過渡到「幼者本位」，小說裡的幼者卻被客體化成「被拯救者」，有待長者前來拯救。作為「幼者本位」原是對傳統文化中的「長者本位」制的反抗，當小說裡的幼者走入死亡中，作為另一種反抗傳統的手段時，幼者的「本位」卻已悄悄移位。同樣是對傳統的策反，可是幼者卻在作者的反傳統中被邊緣化成「被拯救者」。孩童的屬性在變位中呈現異動，從國民性重構的指標變成傳統機制的受害者，以其凋零突顯

36 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樣作起小說，《魯迅全集》，卷4，頁508。

傳統封建的磨刀霍霍。

當用西方的發展模式拓展現代性時，農村逐漸被城市取代，農村的未開發性正是傳統封建的潛藏之地，為五四作家撻之伐之。魯迅筆下的鄉土也有許多傳統的殘餘，成了停滯落後的農村。風波以「無思無慮，這真是田家樂」的黃昏田景揭開序幕，裡中卻處處跟不上革命的步調，已是民國六年，農民卻生活在「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狀態中，如對張勳復辟感到陌生，謠傳「皇帝會坐龍庭」的消息（已除去帝制）。面對愚昧守舊與終日唸著「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曾孫女六斤壓抑不住內心不滿，可是又怕被認出，於是直奔到河邊，藏在烏柏樹後，伸出雙丫腳的小頭大聲喊：「這老不死的！」小孩之直率一覽無餘，顯現了對古老世界的反叛姿態。當城鎮人民開始剪下辮子，村民仍處在支持或反對辮髮的爭議中，小孩卻無法在革新的潮流下受惠。農村阻擋了外在文明的侵入，魯迅當然不會輕易放過批判的機會，把孩子的屬性控緊在受害者的層面上，以反撲傳統。在農民對辮子風波極具戲劇性的見風使舵心態中，六斤悄悄步上裹腳的傳統，形成最大的反諷：「伊雖然新近裹腳，卻還能幫同七斤嫂做事，捧著十六個銅釘的飯碗在土場上一瘸一拐的往來。」雖然在開場時顯見反叛傳統個性的六斤，可是仍無法自身其外，傳承著上一代的枷鎖，土場形如封建體制的暗喻，傳統的女性就如此「一瘸一拐」地走了幾百年。

由此鄉土在西方現代性的對照下，一再替傳統封建背黑鍋，似乎成為傳統的所指（signified）。為了「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一再把鄉土寫成病態社會，如故鄉裡敘事者因老屋即將出賣返回睽違二十餘年的故鄉，作為告別老屋的儀式，重逢童年時家裡雇農的兒子潤土。敘事者在回憶中強調了潤土在其心中的「小英雄」形象，夏天時到海邊撿貝殼、冬天時能裝弓捉小鳥、雪地上捉麻雀，能講各式鬼故事，管西瓜、防獾豬、刺蝟，潮汛來時觀看跳魚，兩人拆解了主從關係建立起深厚的友情，潤土的形象甚至成了敘事者的原鄉記憶：「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頸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魯迅對農家孩子的純真活潑寄予深切的關愛，可是並非如冰心般滿足於對童真的頌揚，而是對農民社會有著更深層的洞見。這位當年的「小英雄」如今「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表情；動著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

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老爺！』」那曾經被拆解的階級觀在時移事往後又重新建構，敘事者與潤土已隔遠，潤土甚至要兒子水生來磕頭。潤土的極端轉變令我們不得不注意這些小孩是如何生活過來的？「多子、飢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中國的希望繫在孩童身上，可是當這批孩童長成後，卻又走回到傳統的桎梏。由此，敘事者不只告別了老屋，以其童年記憶的幻滅，作為對農家子弟的美好形象的告別儀式，要到哪裡建構孩子 / 少年的形象範本？在魯迅的批判體系裡，鄉土徒然成為一種缺憾，如「潤土」本身的名字就帶有傳統封建體制的期許，其頸上套著明晃晃的銀圈，乃是父親怕他死去，向神佛許願得來將他套住，可是卻成為傳統的枷鎖，將之套得無法脫身。

社戲 的敘事者隨母親返回鄉下娘家，透過看戲、評戲、偷豆、煮豆的過程，展現了農家孩子的粗獷、活潑、膽識。童年看社戲的完滿經驗變成了原鄉記憶，伴隨著敘事者，往後長成後「我」在城市裡看戲的不愉快經驗，投射了對原鄉的緬懷。一些論者從城鄉對照的角度，指出五四知識分子承受都市文明的迅速膨脹，缺少精神的充足準備，一旦精神受挫，不約而同魂歸鄉村中的淳厚古樸的人倫關係與道德習俗中尋覓精神的慰藉。可是對傳統疾惡如仇的魯迅未必如此輕易被鄉土的人倫與道德收編，尤其是他在十二歲時祖父周介孚因科場案入獄，他被送往農村外婆家暫住，<sup>37</sup> 對農村的生活有深入的體會，在 故鄉 裡就可看出他對鄉土的強烈批判。同樣是鄉土所賦予敘事者「原鄉記憶」的故事架構， 故鄉 裡的「我」親身闖入「原鄉」，鄉土世界在現實的透視下百孔千瘡、民生凋敝，遂使原鄉破滅。 社戲 的敘事者單純以記憶對童年地帶做一番巡禮，反得以保留原鄉記憶。兩篇小說對照下，鄉土的美好只合乎存留於想像中，一經闖入便自我解構。

滿目瘡痍的鄉土，正好與前述魯鎮病重的小孩呈現出畸形的孩童世界，圍繞在他們身邊的人物是由賴皮、看客等構成的庸眾結構，如 明天 裡主動來抱賣兒的藍皮阿五趁機佔單四嫂便宜，「從單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中間，直伸下去，抱去孩子」或是 藥 裡的康大叔與茶樓的茶客望著頻頻咳嗽的小栓，直讚蘸了血的包子定能治好小栓的病，可是背後隱藏著這些庸眾的封建迷信與對革命理念的隔閡，瑜兒乃至小栓的死亡並沒有引發任何反

37 參考 魯迅年表，〈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臺北：海風，1992），頁 279。

省，只有空嘆息的母親追憶亡子的悲情畫面。

作者一再讓孩童的失落導因於鋪天蓋地的封建體制，如寶兒服下何仙姑開出的藥方、小栓吃下沾了被處決者的血的包子，我們由此發現魯迅的策略，跟往後三十年代左翼敘述極不同的是他以退為進，並非塑造出會發光的兒童，激進地向封建世界吶喊，指證傳統的弊端，卻是透過「受害」的位置佔據了「被拯救者」的位置，進而反傳統，「面對『死』的終極意義的悲涼，他沒有屈服，沒有沈淪止息，而是選擇了『反抗』的價值。」<sup>38</sup>汪暉確切指出「魯迅『反傳統』的內在動力還不是對某種價值信仰的追求，而是一種更深沈、也更基本的危機感——生存危機。」<sup>39</sup>游移在生死邊緣，正好讓這些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承擔起打擊傳統的任務。

## （二）孩童「徬徨」：向庸眾靠攏

如果《吶喊》的書名預示了對「鐵屋子」這個封閉傳統的吶喊，《徬徨》則顯而易見在整個精神上的逆向轉變。李歐梵曾就此指出：「在《吶喊》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由於響應《新青年》夥伴們的努力而作的樂觀調子，到二年代中期，他的戰鬥精神就已消失了許多。正如第二個集子的書名所顯示的，他的情緒已轉向『徬徨』，轉向波動的懷疑和煩惱的哀傷，調子是辛辣而痛苦的反諷。」<sup>40</sup>五四運動後不過數年，當年新文化運動的前驅者發生很大變化，或高升隱退，或從文化領域轉向政治層面的抗爭，《新青年》也走入了歷史，魯迅落得「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sup>41</sup>「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哪裡呢？」<sup>42</sup>

在抗鬥精神的消退之下，小說裡頻頻出現知識分子、孤獨者在庸眾的圍觀中走向失落或是回歸舊文化系統，如孤獨者的魏連受違背自我的原則

38 皇甫積慶，「死」之解讀——魯迅死亡意識及選擇與傳統文化，《魯迅研究月刊》，214（2000.2），頁26。

39 同註14，頁67。汪暉文中進一步解說「以生存的危機來表達對傳統文化的否定，也即以人與民族的危機狀態這個『果』回溯傳統文化之因，其結果便是在思想方式上將『傳統』作為一種有礙生存的整體結構而予以否定。」

40 李歐梵，短篇小說之一：現代化技巧，《鐵屋中的吶喊》（臺北：風雲，1995），頁75。

41 魯迅，《集外集》題徬徨，《魯迅全集》，卷7，頁144。

42 魯迅，《南腔北調》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卷4，頁455。

出任杜師長的顧問、在酒樓上的呂韋甫從「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走向「敷衍衍衍，模模糊糊的生活態度」；或者是筆調對準於類似肥皂四銘、高老夫子、高幹亭等假道學或偽知識分子的批判。這似乎取消了知識分子感時憂國的使命感，當藥裡懷著革命理想的瑜兒、狂人日記狂喊「救救孩童」的狂人都成了明日黃花，處於「受拯救」位置的孩童要等待誰來挽救呢？

弔詭的是這時期小說裡的小孩走出死亡、病痛的陰影，已不再是病病殃殃，即或是有死者，卻是作為回憶來敘述，如孤獨者的母親回憶小兄弟的死亡、祝福裡祥林嫂回憶被狼咬走的小毛，真正出場的小孩免於夭折、病痛，可是卻接受了更嚴苛的考驗，將他們放到庸眾的結構中加以審視。

從《吶喊》開始，魯迅便淋漓盡致地搬演「看客」的心態，如阿Q正傳與藥在看殺人砍頭的樂趣中，卻呈現出麻木的神情。作者25歲時看一部日俄戰爭的幻燈片時深受刺激，一位體格健壯的中國人被日軍指為俄探，砍頭示眾，圍觀的中國人卻神情麻木，由此棄醫從文的魯迅對看客有諸多批判：

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穀穀，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彷彿頗愉快，人們的犧牲能給予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sup>43</sup>

令人驚恐的是到了《徬徨》，孩童大量走入了看客或庸眾的結構中，事實上在《吶喊》集裡的孔乙己已出現孩童從受害者走向看客的趨向，敘述場景以分成內外座位的酒店為中心，內裡是長衫顧客、而外座是短衣幫，小夥計因樣子長得傻，被分到外面做事，但又做不好，改為專管溫酒的工作。在酒店隱含的階層制中，他連續兩次受到排斥退居於更下階層。魯迅的筆端終究不是在於謳歌孩童的飄零身世，卻用觀看成人的嚴苛標準檢視孩童，呈現出他所欲批判的國民性。孔乙己滿嘴「之乎者也」，被眾人嘲笑調弄。小夥計在面對「掌櫃是一副凶面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叫人活潑不得」的壓抑中，卻被允許參與嘲笑喝醉酒後醜態百出的孔乙己。當孔乙己要考小孩時，他的直接反應是「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麼？」在眾人圍睹無法適應新社會的舊

43 同註16，頁165。

知識分子孔乙己的悲哀下場，將悲劇消遣成荒謬喜劇時，受到壓制的孩童卻從社會體制裡接收了同樣的伎倆，赫然走向壓人的體制，在排擠弱者的共犯結構中佔了一席之地。

孩童步入看客群中在《徬徨》裡一再被「發揚光大」，如 示眾 在大太陽底下，掀起「看」與「被看」的盛典，事件的中心原是巡警用繩頭綁在一位犯人身上的，一群由各社會與年齡階層組成的「看客」團不斷移動進退，以占據最有利的觀看視角，原本是示眾的犯人卻同時張望著看客，而看客群中也互相張望，最引人注目的是小孩走入看客群裡，集體陷溺在麻木的狀態中。胖小孩學起眾人「研究著這發亮的禿頭」，卻沒人曉得犯人犯了什麼罪，也沒興趣探索。魯迅激烈批判了國民的愛「看」，這些人即或不知就裡，圍在人群中觀看卻能享有樂趣，從犯人的白背心，看到發亮的禿頭、巡警的提腳、老媽子鉤刀般的鞋尖、無所不能看，在層層的對看中，揭示了人群的愚昧、湊熱鬧的心理。小說裡的兩位小孩：賣包子的胖小孩與小學生對「看」的熱切絕對不輸給大人，作者刻意在兩處用了相同的誇張敘述語句來形容兩人：「像用力擲在牆上而反撥過來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飛在馬路那邊了」，飛著似地湊入人群中，鑽來鑽去，尋找有利的視角，其中顯示出更深層的意涵：小孩從「被拯救」的位置走入了「看客」的共犯結構中。

透過孩童位置的轉移，我們看到魯迅在架空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時，其實也架空了孩童「被拯救」的位置。如果說拯救／被拯救的關係預設了迫害／受害的前提，當孩童從「吶喊」時期的受害位置出走，拯救者／被拯救者的架構也被瓦解了。由此魯迅不再喊「救救孩子」，反而處處突顯孩童的庸眾特質。 長明燈 裡的長明燈象徵傳統痼疾的長明燈，瘋子以為吹熄了「就不會有蝗蟲，不會有豬嘴瘟」。小孩卻走到「迫害者」的位置，加入鎮上代表封建力量的當權派與圍聚在茶館的次團體，聯手欺壓瘋子，把原本屬於拯救者的瘋子禁錮，同時象徵了拯救者／被拯救者關係的解構。

魯迅在 孤獨者 裡具體而微地處理這兩者的關係，犀利地寫出兩者如何經由變位走向失落中。不願與世同污、生性怪僻的知識分子魏連受篤信「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大人的壞脾氣，在孩子們是沒有的。後來的壞，如你平日所攻擊的壞，那是環境教壞的。原來卻並不壞，天真，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他對孩童原抱著很大的希望，

與「幼者」之間的關係，突顯出其中的危機，如「長者」對「幼者」的忽略，或是當「幼者」走向帶有權力意涵的「長者」位置時卻反而壓迫起「幼者」。為改變不良的惡性循環，應以「義務」思想來取代傳統的「權力」觀，「洗盡了東方古傳謬誤的思想」，他在《我們怎樣作父親》一文，提出父親教育兒童的方法，第一是「理解」，第二是「指導」，第三是「解放」。<sup>17</sup> 在這種兒童教育的架構下，使得他一方面對教育兒童的傳統方式做了諸多反思與建議，激烈批判摧殘孩童的舊文化機制，一方面在「童年概念」(concept of childhood) 與「兒童對待」(treatment of children) 的層面上對孩童的面貌、特質等有眾多發現。

二十四孝圖 裡，魯迅揭開二十四孝中的荒唐、虛偽，其中他感到最不滿的是「郭臣埋兒」與「老萊娛親」，前者記述郭臣欲埋掉幼兒以免分去母親的糧食，後者批判七十多歲的老萊子「詐跌仆地，作嬰兒啼」<sup>18</sup> 以取悅母親，當中的不符倫理或是矯情，對兒童做了不良示範。可是他的批判視角並不停留於過去，對當今的孩童心靈如何受到傷害更是關注：在「改革過的中國」，當孩子早已從「孟京哭竹玉祥臥冷」的古訓中蛻出時，居然又有一些新式的「愛國之士」，「或者用筆，或者用舌，不怕勞苦的來給他們教訓。一個說要用功，古時候曾有囊螢照讀、鑿壁偷光的志士，一個說要愛國，古時候曾有十幾歲突圍請援、十四歲上陣殺敵的奇童」<sup>19</sup> 的觀念。

對傳統大開殺戒時，讓我們看到五四學人以西學來「糾正」傳統的策略，他從西方引入兒童讀本，如翻譯《愛羅先珂童話集》、《錶》、《小約翰》等，對西方兒童的大量翻譯成了五四文壇可觀的成績，兒童文學的創作與理論架構的建設漸受到重視。他在翻譯之餘，親身創作以兒童為題材的作品，如其《朝花夕拾》是一系列追憶往事的童年母題的作品，其中《五猖會》、《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篇更是處理了童時的受創經驗，回顧童年的「坎坷」，缺乏尊重兒童的大環境與妥當教育孩童的方式。

17 魯迅這裡的「理解」是針對中國人把兒童當成「縮小的成人」的誤解，他認為孩子與成人世界不同，因此要用「理解」的態度對待孩童。長者不應以命令的方式，而是「指導」，以養成其耐勞體力、高尚道德、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解放」是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成為獨立的人，而非屬於父母的人。同註 11，頁 136-137。

18 魯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圖，《魯迅全集》，卷 2，頁 250。

19 魯迅，《且介亭雜文》難行和不信，《魯迅全集》，卷 6，頁 49。

長明燈、孤獨者、示眾等向庸眾靠攏的小孩，沒有吃過肉的孩子還有嗎？魯迅批判庸眾精神上的麻木，或是昏睡在鐵屋子中，他誓言向庸眾宣戰，卻把孩童推向了庸眾的位置，從「吶喊」時期的被拯救位置到如今的宣戰對象，情何以堪？更尷尬的是魯迅在「徬徨」時期似乎不再做未來的夢，不再宣戰。原本作為庸眾的對立者或宣戰者已經移位，如魏連受與四銘回歸到舊文化系統，小孩則步入庸眾群中，兩者又從對立位走向平行的失落中。

肉體的死亡反而促成甦醒的契機，可是一旦精神步向死亡卻萬劫不復，各類形式的死亡有其繁複的意義，王潤華分析五四小說人物的「狂」和「死」時提到：「不是純粹生老病死的普通現象，它是五四時代歷史和文學的特殊現象，通過各種形式的狂與死的悲劇，作者提出對中國文化之反思，對傳統之攻擊，對理想未來之徬徨。」<sup>45</sup> 孩童從肉體的死亡走向精神上的死亡，正好突顯了魯迅從「吶喊」到「徬徨」的心路歷程的轉變：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假使尋不出路，就繼續夢好了，萬不可做將來的夢，切不可喚起許多人來，為將來的希望受苦。<sup>46</sup>

這段談話主要是延續著魯迅當年跟錢玄同「鐵屋子」的爭論，當年他因為「希望在於未來」而抗爭，抗鬥的精神如今已變成頹唐，沈痛地說出「萬不可做將來的夢」。

五四在對「人」的發現中，魯迅小說裡卻由庸眾群構成，「是一群無名無姓、面目混沌、無思想無意識，有時僅只做為小說的背景或人物生存的環境而存在，卻具有令人壓抑甚而至於吃掉『孤獨』『狂人』力量的群體。」<sup>47</sup> 如上所述，孩童走入這批張牙舞爪的庸眾群中，令我們關注的是孩童的屬性又再次被轉換。孩童身上寄寓了成人的昏庸、麻木、市儈、殘忍，跟作為體現現代性表徵的孩童的屬性迥然不同。因此在這「徬徨」時期，明顯看到魯迅對孩童屬性的建構已從國民性的重塑逆轉到毀滅性的民族文化寓言。孩童的屬性被召喚到成人的國民劣根性中，如魯迅在一篇文章裡提到：「窮人的

45 王潤華，五四小說人物的「狂」與「死」與反傳統主題，《魯迅小說新論》（臺北：東大，1992），頁48。

46 同註16，頁161。

47 孫馳，作為魯迅小說群體形象的庸眾形象，《湛江師範學院學報》，21：2（2000.6），頁52。

孩子蓬頭垢面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裡轉，轉得大了，都昏天暗地的社會上轉，同他們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sup>48</sup> 賣包子的小胖與呆在家裡的學程正好可代表這兩類兒童，生長背景不一樣，卻同樣走向庸眾的位置。

#### 四、失去孩童：「在」而「不屬於」的童年情境

這批在城鎮、農村擺盪的孩童，或枯槁瘦黃、眼神呆滯步入死亡，或是走入看客群中，若是以魯迅一再強調的「將來是子孫的時代」，很反諷的是他們不讓人見到光明的未來，甚至成為「新中國未來記」的終結者。走過五四，站在另一個時間點上，卻讓我們不得不反思魯迅與同時代的作家在引起療救的注意或放棄療救時，是否耗損了兒童的形象？在西方啟蒙思潮影響下，秉持著「幼者本位」的魯迅反對從「成人世界」關照小孩，可是卻一再在小說裡把小孩禁錮於幽暗的文化傳統或徬徨的未來，用犀利的筆鋒挖掘出小孩身上隱含的「國民性」，以死亡、蒼白或市儈、殘忍的面貌來見證這新舊交接的社會。嚴格而言，其筆下的小孩始終被拋棄在孩童的情境外，或是魯鎮的酒店、單親的家庭、跟不上革命步伐的農村，任由封建體制飢腸轆轆地啃噬，完全沒有回歸的機會，只能成為「異鄉」人，歸返不到童年的情境。失去童稚的他們，接踵步上沒有光明的所在，黑暗中述說著無盡的吃人故事，以其凋零的面貌反映作者對中國未來的憂患。

魯迅從一開始便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造置於兒童人格、素質、價值觀念更新的基礎上，從對國民性重塑的期待到庸眾特質的注入，孩童的屬性不斷經由成人的想像重構、異化、斷裂。當中無論是「吶喊」或是「徬徨」，孩童始終高高掛在政治的層面上來理解，啟蒙思潮、國族論述如經緯般穿梭其身，可借用梅家玲教授對少年的研究來看兒童的屬性：「『少年中國』所召喚出的，遂不僅是中西政治文化交會下一時的少年激情，也是百餘年以來，新中國輾轉於救亡圖存之道上的種種血淚滄桑。」<sup>49</sup> 兒童群在救亡圖存的理念上展現身段，卻促成了其類型化的形象，共相多於殊相，「幼者本位」下的

48 魯迅，《熱風》隨感錄二十五，《魯迅全集》，卷1，頁295。

49 同註8，頁250。

「個體自我」移位向「集體自我」，進而抹消了孩童作為生理上的屬性。周蕾在評孩子於教育體制的地位時說：「孩子們再不是 用拉康（Lacan）的心理分析劃分 前象徵幼兒期的一員，他們已是社會主要機制 即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謂的學校是『意識型態國家機器』 的參與者。」<sup>50</sup> 周蕾的主要觀點是孩童從生理現象來了解轉換到社會文化、政治的層面，五四的這批小孩當然也不是以「前象徵幼兒期」的生理現象來理解，其涉及到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層面比起周蕾論述的學校要來得更大，是整個政治體制、國家體系、文化系統的參與者。孩童背負著沈重的負擔，從新文化運動過程中負責開拓現代性，批判傳統到往後左翼的建國立民，叫孩子太沈重！

孩童屬性經由政治想像的建構，讓我們一再看到類似賣兒、小栓、妹子等病死、被吃的受害形象，或是酒店小夥計、大良二良、賣包子的胖小孩等顯露的市儈嘴臉、湊熱鬧心態的迫害形象。無論是受害或迫害，都帶出更深層的意涵，他們圍砌出慘澹的失樂園。「失樂園」呼應的正好是魯迅本身在傳統與未來的時間面上的疏離，他一方面如一般五四知識分子將「社會／文化／政治秩序必須做一個整體而予以否定」，<sup>51</sup> 一方面又時而對「自我靈魂的挖掘與對啟蒙本身的拷問」，<sup>52</sup> 從而質疑起未來的希望，因此自我放逐於傳統與未來，孩童在他的深沈的焦慮中找不到出口。受害者只能被鎖定在「被拯救」的位置，可是拯救者卻一再缺席，庸眾圍聚一團，在小說中實已構成禁錮的圖像，在這背後又隱藏著魯迅將兒童鎖定在其對中國的過去、未來的焦慮上，構成另一種形式的禁錮。我們看到作者在打破象徵著鐵屋子的「長者本位」時，卻替幼者製造起層層禁錮童真的鐵屋子。孩童屬性的敘述主權完全被成人侵占，其主體性一再被抽離，當他們被推到政治結構中心展現身段時，卻弔詭地被邊緣化或排除於他／她所處之外，形成「在」而「不屬於」<sup>53</sup> 的童年狀態。

50 周蕾， 男性自戀與國家民族文化 陳凱歌「孩子王」中的主體性，《文化批評與華語電影》（臺北：麥田，1995），頁103。

51 同註14，頁64。

52 譚桂林， 魯迅小說啟蒙主題新論，《魯迅研究月刊》，201（1999.1），頁28。

53 汪暉從文化心理結構來看魯迅在新舊社會中「在」而「不屬於」這兩個社會，而本文借用此語指涉其筆下的兒童，雖處在童年狀態，可是卻被推向政治文化的象徵，因此孩童很尷尬地被放逐童年的位置外，不屬於童年，變成「異鄉人」。

魯迅把兒童放在被封建文化摧殘的弱者地位或是庸眾群中加以審視，若我們追蹤到往後三 年代的左翼敘述，可更完整看出孩童屬性的轉變。王統照（1897-1957）的《雪後》抨擊吞噬美好童心的黑暗社會，葉聖陶（1894-1988）的《小銅匠》指控陳舊的教育對兒童人格、個性的抹殺與扭曲，冰心（1900-1999）的《最後的安息日》描寫童養媳的苦難生活與不幸的命運，如魯迅筆下的一系列孩童，展示於「被害」的位置上。可是卻出現另一批放在「革命」的地位上的孩童，以其激昂的面容向舊有的世界發出挑戰，這一系列從受害的兒童轉化出來，可以吶喊、宣傳口號的孩童，如郭沫若（1892-1978）的《一隻手》，童工小普羅等人受到廠方的剝削，組織了全島工人總罷工，推翻資本主義，替左翼敘述立下書寫範本。

孩童的屬性一再置換，從魯迅的孩童的失聲狀態到左翼敘述的「高分貝」吶喊，呈現出被傳統打擊到打擊傳統的趨向，在政治版圖上豎立起英雄碑塔，看似愈來愈有聲音，其實更遠離了童年的情境。孩童的屬性被建構成革命的範式，在「救亡存國」的主題下，孩童從魯迅小說裡「被拯救」的位置轉換到「拯救者」，其聲音卻愈隱匿，甚至被消音了。無論是默默被吞噬的「失聲」狀態或注入革命的範式，雖然各有其特定的批判對象，這批小孩卻都帶著濃厚的政治理念，放逐於童年情境外，由此五四的發現兒童導致再一次的失去孩童。如果我們觀察毛澤東（1893-1976）在延安對魯迅的孩童的詩的詮釋，會更清楚看出這種趨勢：

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裡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說什麼兇惡的敵人我們絕不屈服。「孺子」在這裡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sup>54</sup>

毛澤東對「孺子」的政治性的詮釋，從西方啟蒙主義轉到馬克斯主義的無產階級，更進一步脫離了兒童的生理與心理性，變成一種政治的象喻，「孺子」的所指已經擴大到無產階級與人民大眾，若與共產黨員、革命家、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對比則顯示出如魯迅的「拯救者」與「被拯救者」二元對立的架

---

54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卷3，頁878。

構，當中牽涉到其權力運作的策略，魯迅將兒童放到「被拯救」的地位，毛澤東則將其政治符碼下的「孺子」放到「被服務」的層次上。兒童的屬性由此在不同的話語體系中不斷轉換與置變。如果說激進如小普羅的兒童，從階級鬥爭對資本主義批判，或者毛澤東的「孺子」經由無產階級理念的抗爭展望未來，孩童在政治上的中心化卻注定了其離心化的悲涼。

當魯迅設法打破傳統的「長者本位」，號召解放孩童，其「救救孩子」的方式與內容令人側目，如前述「理解」、「指導」、「解放」兒童的教育觀是以西方的教育方式為本，以養成孩童耐勞體力、高尚道德、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被譽為「青年導師」的魯迅顯露出其「導師」面貌，替孩童預設了以西方價值為範本的模式。在一片「幼者本位」的主張中，鄭振鐸（1898-1958）當時已很銳利看出其中的困境：「在成人的灰色雲霧裡，想重視兒童的天真，寫兒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幾乎是不可能的企圖。」<sup>55</sup>成人在塑造兒童的理想情境時，實已將自己的看法附加予兒童身上，文本後隱藏著「救拯者」的角色，尤有思考空間的是符碼的轉變，把孩童從中國傳統的符碼抽離出來，卻馬上置入西方的熔爐裡，這種對孩童的預設是真的發現兒童了嗎？中國的孩童與西方的孩童畢竟有別，當用西方的兒童觀來審視中國兒童時，如廖咸浩所說「把西方的成長經驗予以依樣畫葫蘆，無法真切抓住本土的成長經驗。」<sup>56</sup>廖氏進一步指出西方在現代化的歷程，原先用以支持或挑戰布爾喬亞（bourgeois）<sup>57</sup>的價值在收編／反收編中產生諸多衝突與糾葛，到了五四新文學「在西方布爾喬亞體制的收納與中國知識界的不明究理下，變成了內在毫無衝突與斷裂的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這些都一股腦兒被挪做『反傳統、反封建』之用。」<sup>58</sup>

追求現代化的五四作家對傳統激烈批判，體現了孩童／未來的不可盼來

55 鄭振鐸， 稻草人 序， 《葉聖陶研究資料》（北京：十月文藝，1988），頁365。

56 廖咸浩， 非西方成長（小說）的試煉：在反叛與扎根之間，《幼獅文藝》，558（2000.6），頁69。

57 「布爾喬亞」是西方歷史上自文藝復興開始醞釀，到19世紀全面主宰西方社會的「中產階級」，由於以商業活動起家，價值標準以金錢為本，受到以超越性價值（如宗教價值或人的理性）的信徒的批評，不過布爾喬亞卻促成了商業體系、民主制度等，在西方的現代化中有其正反兩面的價值判斷。

58 同註56，頁66。

自於傳統封建的迫害，因為「傳統是『前現代』(pre-modern)的，故必是封建與落伍的」，<sup>59</sup>把所有的責任都歸於封建體制，製造出一群統一形象的孩童，卻無法更進一步爬梳富有歧義的文化傳統，籠統地將古代兒童化約到「成人本位」下，以達到五四作為對過去整體傳統的反叛的目的。這當中忽略了時間的流動性，「過去」與「現在」事實是變動不居，每個朝代「當下」教育兒童的方式的差異性並未獲得區隔，我們若借用熊秉真從社會學研究中中國歷代兒童史的論述便可發現，宋代「入理」與「入情」的幼教模式或清代的「辯體罰、論同情」，<sup>60</sup>與「傳統」的幼教模式有諸多不同之處，魯迅將之視為整體性來批判，卻錯過了從當中的差異性反思、批判的契機。

雖然五四作家時有自我意識，如魯迅認為兒童與成人有別，或周作人批判「專為將來設想，不顧現在兒童生活的需要生活」，<sup>61</sup>但他們用西方啟蒙體系發展出的兒童觀念，對中國「長者本位」的批判與「幼者本位」理論的建構，有諸多可反思的空間。魯迅對孩童的論述如上述圍繞在「童年概念」或「兒童對待」的層面上，背後正好預設了西方近代來對兒童與成人二元對立的特性，衍生出幾個問題，如二元對立的架構背後實已預設了「拯救者」的角色，孩童的主體性已遭否決。另外西方近代的成人／兒童的二元區分的假設是否與中國的兒童觀吻合？熊秉真認為「傳統中國文化以兒童或童年確實有別於成人後成年，但兩者在人生的歷程中呈一互為消長而彼此兼有的狀態

童年與成年並非西方近代文化習慣或心理學概念上所指截然二分的兩階段。」<sup>62</sup>成人／兒童的二元區分或彼此兼有，正好可做為我們反思魯迅的兒童書寫的參考座標。

## 五、結語：叫孩子太沈重

魯迅曾以「摩羅詩人」的榜樣為自許，卻因時代的諸多變動走向失落

---

59 同註 56，頁 67。

60 熊秉真所謂的「入理」是指程朱理學為主的「製造小學」之舉，受智識教育者的年齡大為降低，甚至降低到四、五歲者，將孩童收束在一個新的感化與管理系統。「入情」指關心幼教者對教學內容的反思與改革，以更適合兒童的心理。

61 同註 10。

62 同註 12，頁 315。

中。我們從魯迅筆下的孩童切入，也能看到前引李歐梵所論述的「吶喊」到「徬徨」的精神轉變。在《吶喊》集裡，雖然出現一批病痛或死亡的孩童面貌，但是「狂人日記」仍然發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的悲愴呼聲，正好投射了他對未來的希望；「故鄉」雖然在鄉土的幻滅中，卻把希望寄託於下一代：「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或是收入小說集的两篇自傳式的小品「鴨的喜劇」、「兔與貓」裡小孩清脆的笑聲躍然紙上、「社戲」看到一群不受到封建荼毒的農家小孩；或是「藥」裡在瑜兒的墳上添了花環，「明天」裡不敘述單四嫂子沒有看到兒子的夢，根據魯迅的說法，他用了曲筆，因「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sup>63</sup>可是到了《徬徨》集卻全是未老已衰的小老人，身上濃縮著魯迅所批判的國民性，「孤獨者」大良二良骨子裡的成人市儈、拿著蘆葉片喊「殺」的幼兒，「示眾」裡殺氣騰騰的大胖，「肥皂」裡學程亦步亦趨於其假道學父親，絲毫不見生命力。「孩童的前程」、「未來必勝於過去」等信念徹底遭到動搖質疑，這時魯迅已不再出現曲筆，鋪陳出悲觀沮喪的基調。這一群全然失落的孩童，勾勒出魯迅對「鐵屋子」理論的深層焦慮：

在這黑暗社會生活著的人們      在這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裡熟睡的人們有幾個能幸免不被悶死？

這批孩子被魯迅犀利的筆鋒放逐於童年的情境，驅入牢固的鐵屋子內，檢視其走向死亡或衰弱的必然命運。孩子帶有如此大的轉折，其屬性一再被重構，顯示了孩童的發現與失去是一體兩面的。魯迅曾經鼓吹孩童自有其不同於成人世界的孩童世界，可是小說中的小孩卻具顯出「成人的世界」，同時更反映了作者本身精神面向的轉變。當「救救孩子」的吶喊論調在其小說裡行漸遠去，正好可窺探出魯迅對整個新時代的徬徨與精神的失落。

在新舊中國的交嬗中，孩童的屬性很明顯地在話語體系的轉變下，從「長者本位」移位向「幼者本位」。同樣的在魯迅個人「吶喊」到「徬徨」時間點的更換中，「幼者本位」也一再移位與斷裂，從國民性的重構到庸眾特質的注入，或是從打倒傳統的鐵屋子到禁錮童真的「鐵屋子」，顯現了 Stuart Hall 所稱「屬性」並非一成不變，隨時代、環境、場域的不同而有所變，乃

63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卷1，頁418。

是與多重異己的敘述 (other narratives) 互動下形成的，在塑造的過程中受歷史與差異等因素影響。<sup>64</sup> 孩童屬性的建構過程中，無論是長者 / 幼者本位，或是拯救者 / 被拯救者的架構，都隱然出現權力的位觀，孩子被放到國族運命起落的歷程加以凝視與想像。

站在現代性的分水嶺上，魯迅理應有更好的機會發現兒童，可是「對於救亡圖存的中國人來說，集體的夢想大於個人的夢想」，<sup>65</sup>「兒童本位」非但未得到充分的發揮，卻背上國族重擔，形如 風波 的六斤「一瘸一拐」，一路搖搖晃晃走在土場上，走不出傳統黑暗的鐵屋子，更走不出魯迅批判鐵屋子時卻塑造的變相「鐵屋子」，孩童的失落由此可見一斑。

如果我們把觀點設置在往後對孩童的文學批評上，又可見出孩童的另一層失落。當他們粉墨登場於五四時代的舞臺上，藉由其童年特質所帶來的政治意涵，擺弄姿態萬千，弔詭的是往後他們卻近乎銷聲匿跡於文學評論中，王德威就此指出：「作家歷來對他們（孩子）的描寫並不算少，但很奇怪的評者的眼光總未及於此。孩子不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麼？在那麼多有關國家論述、男女情色的大塊文章下，缺乏發言權的『主人翁』的所思所行，其實更加值得注意。」<sup>66</sup> 信然，孩子的論述應加以重視，尤其在五四時代，看似缺乏發言權的「主人翁」卻往往微言大義、一字千金，其一顰一笑吹皺的何止一池春水，甚至與整個家國休戚與共。行至另一個世紀的關口，回頭遙望上個世紀擺盪於新舊文化交接處的孩童，許多被擱置的論述議題有待開棺重審。

---

64 參考 Stuart Hall 著，黃非虹譯，最少的自我 (Minimal Selves)，《島嶼邊緣》，8 (1993.7)，頁 24-31。

65 趙明，論五四文學傳統的內質與張力 兼論魯迅傳統的斷裂，〈寧夏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18：4 (1996.9)，頁 17。

66 王德威，典律的生成 小說爾雅三十年，〈如何現代，怎樣文學 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1998)，頁 441。

## Discovering Children and Losing Children: Lu Xun's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Identity

Kean-Fung Guan \*

### Abstract

Discursively speaking, the identity of children was transformed during China's evolution from a feudal to a republican society. Whil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hildren'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s a nation,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icate Lu Xun's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identity. By placing the discourse on children that changed from being "elderly orientated" to "youth oriented"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gression of Lu Xun's spiritual development from *Call to Arms* (*Nahan* 吶喊) to *Wandering* (*Panghuang* 徬徨), the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onsequent shift of the image of children. *Nahan* depicts children as being victims poisoned by traditional culture, revealing Lu Xun's unyielding resistance against old trad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Lu Xun's *Panghuang* represents a cry of bewilderment, as the children unexpectedly became accomplices of the philistines. One can argue that Lu Xun, despite his call to save the children, put that era's responsibilities on their shoulders, imprisoning them within an ideological prison. In this process of perpetu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discovery and loss of children in the newly "youth oriented" China were in reality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

\* Kean-Fung Guan is an M.A.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eywords:** Lu Xun 魯迅, children, identity, *Call to Arms* (*Nahan* 吶喊),  
*Wandering* (*Panghuang* 徬徨)